

□ 乌兰察布
文化研究丛书

游牧文明的忧思

TROUBLED THOUGHTS ON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满都麦小说评论选

A SELECTION OF CRITICS ON MAN DU MAI

主编：马明奎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本书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多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研究”
(编号:11YJA751056)阶段性成果

游牧文明的忧思

TROUBLED THOUGHTS ON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满都麦小说评论选

TROUBLED THOUGHTS ON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主编：马明奎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牧文明的忧思：满都麦小说评论选/ 马明奎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80723-892-8

I. ①游… II. ①马… III. ①满都麦—小说评论—文集
IV. ①I207. 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334号

游牧文明的忧思 满都麦小说评论选

主 编 马明奎
责任编辑 胡丽娟
装帧设计 介 霞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0471—2236466 邮编：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乌兰察布市市委机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13千
印 张 25
版 次 2013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892-8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马明奎，1963年生，从事文艺学、叙述学及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现任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出版《暗夜孤航——红楼梦艺术精神研究》、《艺术生存论》、《南永前图腾诗学》等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学刊》、《民族文学研究》、《中州学刊》、《北方论丛》、《浙江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集宁师范学院学报》、《文学评论论丛》、《艺术广角》等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发表文学艺术评论40余万字。还出版130万字长篇小说《归》一部，20万字散文集《悬巢》一本，发表报告文学30万字。获第六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优秀评论奖，第七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一等奖，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满都麦，当代作家，1947年生，肖达（乞颜）部厄勒图特氏蒙古族，成长于杜尔伯特（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大草原。198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中共党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自1972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出版了《满都麦儿童文学集》、《碧野深处》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发表草原文化研究论著与散文近百万字。其小说《瑞兆之源》、散文《绿色的呼唤》等八篇作品曾经编入初高中《蒙古语文》教科书，有多部小说作品在国外发表，50余篇中短篇小说作品被译成汉文发表在《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国内多家高等学府专家学者对他的作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他以小说《巅峰顶上有情歌》等作品连续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首届、二届、三届文学创作大奖，并以《满都麦中短篇小说选》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4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满都麦作品研讨会”，系解放以来第一位母语作家作品研讨。与会高层专家学者对他长期坚持母语创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根基于草原文化，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前瞻性地意识到，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大力弘扬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的游牧文明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赞誉：满都麦的草原文化反思小说创作不仅与时代先锋取得了同步，而且极力唤醒人类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坛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现任乌兰察布市文联名誉主席，自治区文联名誉副主席，自治区作协名誉主席。201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颁发了“文学艺术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前 言

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碧野深处》、《圣火》、《元火》、《祭火》等小说连续发表后,满都麦这个名字就在蒙古母语文坛引起了轰动,评论文章连篇累牍,他被誉为“新时期蒙古文小说探索流向之先锋”。著名作家格日勒朝克图评价满都麦“火”系列小说,在《为文学敖包增添的洁石》一文中指出:“满都麦的作品根基于游牧文化土壤,其草原生活经历和阅历极其丰富,语言叙述优美,生活感悟深刻,思维方式新奇,文学立意深致,写作手法独特,而且敢于涉足层层封禁的领域,立足草原生态文明去探索人性、自然之美,挖掘马背民族仅有的文化矿藏,达到了蒙古语言创作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中篇小说《苍狼·骏马·故乡》、《远古的图腾》、《尾随族群的流星》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2007年,蒙古国最高文学刊物《朝格》转载了《圣火》、《苍狼·骏马·故乡》等中短篇小说。主编赞德来第一次见满都麦就说:“我很了解你,你是把蒙古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新高度的作家……”蒙古国功勋导演巴拉吉尼玛邀请满都麦到他家做客时异常激动地说:“你的《苍狼·骏马·故乡》我拜读了,那是一部站在游牧文化和生态文明的高度,反映草原生态走向衰败,从而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经典之作。之前类此佳作在我国文坛尚未出现。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化风起云涌的大格局下,我们蒙古草原也必将会面临如此遭遇。我想中蒙两国合作,把这部作品拍成世界一流的电影……”

眨眼30年矣!在《游牧文明的忧思——满都麦小说评论选》出



版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作家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如果不是编辑这个集子时关于语境的思考,我也会首先注意到满都麦小说表述了这样一种关系:蒙汉人民本来就是一家人!《春天的回声》的老额吉有一个北京知青的儿子叫李明。《三重祈祷》里老额吉的儿子乌力吉斯荣就是一位八路军指战员。《人与狼》里的红卫老汉倾尽家资想要给儿子娶的是一位汉族姑娘。另一方面,满都麦小说的“反派人物”:既有纵火烧毁翁敖草原的汉族车馆(《马嘶·狗吠·人泣》)、极左而残忍的解放军工作组政委(《人与狼》),也有麻子章京、红卫老汉这样的蒙古人,荡尽家资的摩托曾格、不听祖训的巴图则不仅映射了市场时代进入蒙地的汉族奸商的阴毒凶险,而且反映了一些蒙古人自身的庸愚和贪婪。这不仅是一种胸襟和深度,更是一种理念。我其实想说,不管现实主义把主体性强调得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后现代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渲染得如何剑拔弩张,在真实的民族和文学交往中,至少在我和满都麦之间,我们是心心相印、师友相存的。换言之,我们是超越民族界别,在中华大家庭的身份和关系上实现交往的。可以说,在政治叙事的层面上,满都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蒙古族发言人,他的大部分忧戚来自草原和生态,来自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退休以后的满都麦致力于散文创作,有一半篇幅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阐释。笔触所至,涉及文、史、哲、全部。近期涉足文化设计,不仅阐释,而且建构。他的最新篇什集中描写了游牧文明的内核理念,强力反映草原生态的现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的重建,离开多民族文化的汲取和多民族精神的共构,光有西方是不够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在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沟通和对接时,我们认定蒙古族文化可能更具适应性和同构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亲情和诗意关系,是蒙古族文化领先于儒家思想和西方观念的重要价值……这些都是概括满都麦小说艺术成就的基本前提。

一、满都麦小说创作的历史分期和基本评价

消解草原与内地两个相对静止而独立的地域文化意象之间的对

立,使之贯注于一种时间流动,从而形成空间关联的动态美学观照,是满都麦的基本体验方式,也正是他的前期创作总会出现一个“追寻”模式的原因所在。换言之,那种骑着马向草原深处的追寻,不仅沿着满都麦创作的时间轴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奔驰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而且在空间维面它也由最初的湖边、峡谷拓展到翁袞敖包、草原深处,直到两个守尸魂兔起鹘落的隔世之域。满都麦在时间推移的历史进程中延展和开拓着空间,把时代、地域与主体存在弥合起来,追寻并反思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而不仅仅是存在者。

于1981到1983年间创作的《他曾经是骑手》、《瑞兆之源》、《雅玛特老人》三个短篇及中篇《春天的回声》是第一时期作品,基本主题是歌颂蒙古族的美德,一种融铸了苦难和慈祥、灾难和仁厚的草原母亲形象:苏布达、雅玛特。其其格虽然是个姑娘,但她蓬勃着的主要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气质:敢爱,敢恨,聪明,热烈,一个母亲原型的青春季变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早春时节,满都麦就像那些抽身于冻土深处的嫩芽,饱吸着大地母亲的滋养,以一种新奇的眼光打量着世界,感受着大地的温馨和春风的曼妙。时代的解放和草原的苏醒,成为他最早追寻到的存在体验。他的踪迹并不远,只在峡谷和湖边,他只看到春天的风柳和蓝天白云。

进入第二时期,满都麦就像一个从昏昧中觉醒过来的人,一边搜索着梦里的云丝雾缕,一边回忆着倒下前的姿态。他终于悟到是被人打懵了,满身、满脸都是血。可是伤在哪里呢?记忆中抡起的第一只黑手就是极左政治。从《夜茫茫,他在荒原上》起,满都麦开始冷峻地审视“文革”极左政治。《欠债人》控诉“司令”授意杀人的罪行,但重点反思额尔德木特古斯灵魂深处的昏昧庸弱:为了一个“崭新火红的印有金黄色‘红卫兵’三个大字的365号袖章”居然将喇嘛杀死。虽然他是在领袖崇拜和政治胁迫内外夹击下那样去做的,但是灵魂深处的负罪感使他痛不欲生。《巅峰顶上有情歌》将审视的眼光扩展到祸害草原的恶徒身上,他们族别身份暧昧,思想意旨却清楚:谋杀人以谋取盘羊!《雕龙玛瑙鼻烟壶》是与前三篇互为补证的篇子,满都



麦告诉读者：“文革”式的灾难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对于少数民族情趣和习俗的尊重是全中华的共识，首都北京都能为一个蒙古老人开出特例，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理性和情感。《碧野深处》有着同样的旨趣，但是满都麦已经在捉拿第二只黑手。在反思民族灾难的同时自我追问：为了私利，我是否也在干着见利忘义、侵害自然和生命的勾当？这个反思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已经把思路返回到自身，开启了第三时期的文化反思。

从峡谷、湖边、峰巅，直到草原深处，追寻的视野已经非常开阔。《雕龙玛瑙鼻烟壶》不仅提供了时间意向，让我们感受到时代春天已经到来，而且把草原与内地、首都联系起来，形成语境拓展。它表明，满都麦并未止步于蒙古民族的灾难和处境，而是放在中华民族大背景下审视的，因而超越了地域叙事的视野，进入第三时期。《圣火》、《元火》、《老苍头》、《祭火》等短篇和中篇《三重祈祷》是扛鼎之作，时间大约在 1986 到 1989 之间，其艺术想象和审美体验反映了满都麦特有的母语思维和文化心理，其追寻意向从时代的逆向返回到历史深处，空间从而回溯为时间。如前所说，满都麦的时间审美强调一种“此在”情怀——与处身其间的世界休戚相关、须臾难离的生命关系和语境关联，使“观照”变成某种“关照”。换言之，当上世纪 80 年代的伤痕文学从政治反思进入文化寻根时节，满都麦观照着时代话语和语境建构着他的艺术世界：《圣火》、《元火》、《老苍头》、《祭火》以及《三重祈祷》，体现了毡包、湖边、岩洞、峰巅直到隔世之域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大草原意象及其由空间性向时间性回溯的意向。《圣火》是民族美德的最后悲悼，一份形而上的道德箴言。故事发生在毡包周围的草地和河边，一位老额吉为了一份几十年前的爱的约定信守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的日子，终于在一个傍晚等到男人的回归。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没有人同意这不是真的。《元火》的故事从葛玛溺亡的湖边开始，我们与男主人公一起跟着葛玛的魂灵走入一个岩洞：“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①



满都麦是从文化和人性的观点向我们陈述,那种男女赤裸、婴孩圣洁、生灵之间和谐共生爱意葱茏的原始自然的生存,才是真的人的存在,极左政治逼迫我们去恪守的那种暴戾苛酷的方式不符合人性。《老苍头》的叙述可以称之为“神性叙述”。叙述者的讲述追寻着老苍头的踪迹,再由老苍头的踪迹追寻至老禅师,最后他们共同走向死亡。如果说叙述者是主体,老苍头就是客体或主体间性,老禅师则是本体或一个更加遥远的主体间性,他们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类似圣子、圣灵、圣父。它喻示一种本体意义的颠覆:就蒙古民族的生存方式而言,文化传统的式微就是一个死亡渊藪,现代化则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此种文化和神性的颠覆,到了《祭火》就显现为扎米彦一家三代人的信仰蜕失:祖先崇拜佛主,儿辈崇拜圣祖,孙子辈无所崇拜;到《三重祈祷》就变成这样:佛主崇拜与圣祖崇拜相互倾轧,不仅毁灭了母亲在草原大地上安贫乐道的存活,而且于隔世之域拷打她苦难的灵魂,成为抽象的异己魔力。它们与兵匪流氓同科,共同地肆虐人性,制造苦难。这样的反思差拟全球化语境下精英群体对于儒家传统和乌托邦政治的反思并与之同步,但是完成了满都麦追寻的历时性断裂。他所依赖的文化支撑至此扭断,天维绝,地维折,一次死亡,一场涅槃,空留下苍凉和死寂。

第四时期的满都麦已经从隔世之域挣离,从历史和文化的时间断裂处返回。回到现实,回到草原,在他泣血饮泪的同胞那里驻足,留下一连串可悲的人物写真,《在那遥远的草地》已经是陈年旧梦了,一个美丽得有点天真的故事,基本是一种怀旧。《马嘶·狗吠·人泣》正所谓烈士孤怀,英雄暮年,一种回光反照式的传统人格的展放。《巴图的发财梦》和《“摩托”曾格》是蒙古人进入市场的当代写生,满都麦不仅指陈传统文化的失落,尤其在指陈这样一个事实:失落了传统理性而突然转入市场经济的一些蒙古人将变成弱智,变成一些没有灵性和神意的活物。为了激发灵性续接神性,《四耳狼与猎人》改写了一个狼拯救猎人的因果感报故事,在文化失落之后凄凉死寂的天空下捋出一缕神秘之光——宇宙天道的存在!《两个守尸魂》以嘲

讽和恶作剧的笔调抒写丑陋和不公。《人与狼》控诉人性与狼性的颠覆。《戈壁深处》写两个老人在夕阳下北风里的最后的悲叹：一切都将不再，赖自然生态以游牧生息的传统已无望。满都麦就这样以悲默的叹息为他的小说落幕。这是一种无奈呢，还是一种释然？

大致勾勒了满都麦创作的四个时期之后，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其文化价值：从控诉极左政治开始，满都麦对于民族文化的反思逐渐从外部追讨向自我反省，当他进入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层时，潜入无意识的悖乱和荒诞时，又重新走向现实。满都麦的文化反思在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后工业时代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看传统文化的低能和愚弱，亦即就现实生存来看，这个古老民族的优秀传统并不能提供现代生存的智性元素；一是从人性逻辑看传统文化式微的内在必然，亦即这个文化中的神性和诗意无法对抗现代人性的事实。就此而言，满都麦悲怆满怀，欲哭无泪。但是，这四个时期又体现了审美价值对于历史逻辑和人性本质的超越意向。从峡谷、湖边、敖包、草原的意象扩展过程不仅畅饮了足够丰饶的诗情和神意，播散了亲爱无疆的人性和亲情，而且建构了人类生存和文化存在的四个价值义域，即生态宇宙本体，关怀苦难领承神性的终极人性，人与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共生，诚信忠贞、坚定不移的人的价值看守。这样的义域就不再是蒙古民族的，而是中华全族或人类全体的。就此而言，满都麦小说作为代表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是当之无愧。

二、满都麦小说的生态创作方式及其美学价值

现象学告诉我们，同样作为被给予性条件^②，题材中的原型结构与意象中的原型结构是相通的和同一的，唯此题材乃成为意象的意向性对象。为了论述的简洁，我们略去题材中的原型结构以及意象中的原型结构的论证，直接进入题材分析，我们将获得同样重要的支撑和依据。那么，题材作为“意象的意向性对象”就意味着，作家在以特定意象的眼光（持有特定的原型结构）来悦纳题材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形：

(一)意象吞噬题材,使题材意象化、象征化,在实现其价值提升的同时生成模式,并成为人的现实情境或存在状态。所谓题材,主要指事件,亦即人物的行为和动作。满都麦的前期小说一般都设计一个确定的所在,如湖边、峡谷、敖包、草原。不是一般的环境或场所,也不是舞台,不可以从现实主义去理解,而是意象或谓原型,一些吞噬或繁衍着的母腹或子宫,一个包蕴了苦难和历史的哲学母体。所有故事、人物、生死、悲喜,无不在进入或走出这个子宫,并蕴含了一个“追寻”模式。

《瑞兆之源》和《春天的回声》都是写一个年轻小伙子寻找失散的马匹,远涉他乡,来到湖边,前者找到的是慈祥老人,后者遇见的是美丽姑娘。慈祥的苏布达老人以病苦无依之躯收养那片草原上失散的马匹,包括北京知青李明,是蒙古民族的道德之源;美丽的其其格姑娘聪明、勇敢、技艺娴熟、心地善良,是蒙古民族的生命之源。小说表现的正是道德和爱情的追寻。湖边作为一种处所或环境,其现实主义意趣还存在着,还折射着作家青年时代的浪漫及新时期之初那个大地春回时节特有的遐想和憧憬,没有彻底意象化,但肯定是“我”的理想升腾之境和灵魂皈依之地,只有被充分意象化之后才成为人的处所和情境。到《雅玛特老人》时,意象就变成峡谷。雅玛特老人不仅保护过拉木这样的干部,还养护着受伤的草原生灵,而且,从峡谷走出到大队部时,世界就发生了变化——原始自然、诗意亲情的母性世界蜕变为杀气腾腾、野蛮恐怖的死亡渊藪。拉木正是从大队部的死亡世界逃匿到雅玛特老人的母性世界,才获得生命保障和心灵温慰的。到《马嘶·狗吠·人泣》时,意象衍变为敖包及周边草原,视域扩展了,作为意象的敖包与作为题材元素的草原拉近了——嘎慕喇老人一生一世看守的这片见证着他与孛玛做爱的草原,已经与翁衮敖包融为一体,从而意象化,成为爱、忠贞和生长的象征。到了《碧野深处》和《在那遥远的草地上》,草原就由题材元素意象化为某种历史情境。无论是纳吉德前去安装电视,受伤后在草原深处爬行,还是“我”冒雨追踪坐骑,向远方草原追寻,都变成一个生命圣化的过程,从现实身份提



升,进入哲学和诗性体验。有着乌日罕和美丽姑娘的草原激荡着爱恋和生殖的气息,受伤匍匐的黄羊和脱失系绊的坐骑就成为目标意象。草原意象将生活和爱情的题材涵化于同一时空,成为一种吞噬。吞噬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始程序^③,而是人与世界的相逢、爱悦与知己的相遇,是理想境界对于现实生活的临照,价值对于历史的提升,本质是原型对于题材的摄取和悦纳以及题材的意象化和象征化。

我们体会到,此类意象不仅具有观照和摄取题材的叙述功能,而且是一些价值典范,在满都麦笔下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对比或反衬出现的,具有批判意义。尤其是,在由湖边向峡谷、敖包、草原的意象衍化的过程中,一个可以命名为“追寻”的情节模式延展而出。就单篇看,追寻是题材向意象的进驻,是主人公朝圣般对于理想世界的朝奉;从全部情节看,又体现了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穿越纷繁世相、领悟存在本质的心路历程。意象蜕变,湖边、峡谷、敖包乃至草原,无不隐含了一个原型母腹——一个大子宫。它不仅喷涌、生长出如许故事、人物以及蒙古族文化和存在的方式,而且作为最高价值,确立并承担着蒙古民族的价值存在。如果说德里达曾标举从断脐到破处的断裂宣布个体的生长和独立^④,那么满都麦的“追寻”就是在回归历史、回归母腹的虔诚中完成着生命领悟,是破处向断脐、再向母腹的回溯——他不是从诗意中看到苦难、从道德中看到悲惨,而是从苦难中看到神圣、从悲惨中看到完美。人与他者、与世界、与自然的亲情无不回归历史和传统,变成灵魂和存在的安顿。可以说,真诚地回到历史深处安放灵魂,成为满都麦后现代趣向的深层依据!

(二)题材凝铸意象,使意象题材化、故事化、历史化,从而由意象繁衍滋生出人物和情节。这里的题材已经走出现实主义义域,不再是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反映,而是作者心理深层潜隐的意象,诸如《圣火》的火铛子、《元火》的女人头饰、《祭火》的黄袍马褂等题材,使意象在题材的增补下扩展、放大、变形、夸张,成为一种寓言或神话结构;从题材角度看,就是凝铸意象使之题材化、情节化,使意象作为人物原型滋生出特定的故事和人物,从而赋义。这意味着满都麦有所言

说、有所建构,通过叙述,他将思考和价值变成现实,同样蕴含着一个模式,我们谓之“分散”,就是从一个核心意象衍化出人物和故事。

《圣火》写一个老额吉对爱的看守和坚贞,不似汉族的走西口或闯关东,一种田园将芜、征人将归的诉求,有家室、有桑麻、有田园……这位老额吉只有一个火铛子,以此乃有牛粪、盘羊、茫茫草原以及天上的星辰日月。火是生命,是希望,更是天地间一个约定的神圣见证,它照亮老额吉的全部存在。《元火》中葛玛是一个神意使者,一个美丽高贵的火的女儿,她引领“我”从卧牛石走入被火照亮了的岩洞,而她正是头饰的持有者。她的爱在燃烧之初就包含了不屈、不死、不灭的永恒品格和神性价值。因此由她引领进入的不仅是一个幻觉世界,尤其是弥散着生殖和爱的气息的神意境界,或者说,就是女人头饰这一意象向葛玛、向神意境界的扩散和变现。所有的故事都与头饰有关,都呈现于引领和跟进的进程从而可以理解为头饰的“异延”或“撒播”^⑤。《祭火》中的黄袍马褂是一个核心意象,它是祖先朝圣获得的皇帝的奖赏,无疑是一件圣物。扎米彦老头作为圣物的持有者与核心意象是同一的。以他为原点,祖母嘎皮勒、儿子呼尔乐、儿媳葛尔勒比丽格以及孙子浩日娃,形成一个向外扩散的同心圆——他们面圣的态度一如涡心向外的一层一层、一圈一圈扩散的涟漪,将圣物及其承载的传统精神衍化乃至泛化为一些没有质感的声波和泛音,终归于叹息。

我们同样体悟到,核心意象向着题材、人物和世界的分散、衍化、落实,是一个历史化和世俗化进程,而从火铛子到女人头饰、再到黄袍马褂这样一个意象系列又可概括为亲情和诗意式微、道德和虔诚湮灭的过程。如果说祖先是以前额叩击土地(朝圣)替代马蹄丈量(战争),显示了万古不渝的善性,那么扎米彦老头今天的持守就是一种对于嘈杂和利势的无奈。现代科技和人性欲望的彰显使传统文化被“反吞噬”:不是意象吞噬题材,而是题材吞噬了意象。就像夜空覆盖了套脑^⑥,现代生活方式吞噬着茫茫草原上的孤星零燕,火铛子、女人头饰、黄袍马褂,一一淡入宇宙深处,化入母腹原型。情节也从追寻的线性模式拓扑为涟漪式分散。这是一种由时间长度和深度向空

间广度和高度播撒的题材化过程。

1. 意象吞噬题材直接导致人物原型化,使满都麦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大超越典型化的水平,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符码和言说单位

满都麦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分为四大类:雅玛特老人代表蒙古族老额吉,嘎慕喇老头代表蒙古族老阿玛,其其格是蒙古美女,巴图是败家子。四类形象显然是两代人。老额吉和老阿玛是老一代蒙古人,他们坚守传统生活方式,坚持传统蒙古民族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信念,为了神圣、为了爱情、为了蒙古人的名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下一代则旨趣各异,其其格是青年一代的优秀代表,不仅继承了蒙古族妇女的传统美德,在生产劳动中有着超过男子的技艺和能力,善于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而且在爱情追求中能够洞悉男人的弱点和情绪,显示了过人的勇气和智慧。胆大貌美,坚定不移,聪明真诚,是支撑蒙古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希望之所在。与之相比,巴图则缺乏男人的意志,既经不起诱惑,无法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下保持清明理性,又不接受父辈的教诲,贪婪而荏弱,倔强而无能,在满都麦看来是完全无望传承蒙古民族文化血脉的败家子典型。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所谓典型,是反映论的成果,要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本质。满都麦笔下的这些人物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诱惑是真实的,也的确体现了时代风气,但要说他们代表时代精神或社会本质则是荒唐的。即使像其其格这样学习科学、掌握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领先地位的蒙古美女,也绝难持有真正的现代精神^⑦。而巴图就差远了,醉生梦死,弱智低能,其缺失并不在于科技时代和市场经济下的反应迟钝或封闭自守,而在于忘失祖训,忘记长生天,使一个本应禀承传统精义的蒙古男人沦落为市场时代的小人。此种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丧失,不仅没有导致精明强干和竞争优势,相反埋汰了一己的灵明,亵渎长生天,家破人亡。

因此,这四类人物都不能纳入典型的范畴,而是体现满都麦理性思考和理想精神的一些原型化人物。老额吉是母亲原型的呈现,老



阿玛是父亲原型的呈现,而蒙古美女则是阿尼玛原型于现代情境下的重铸,根本命脉还在传统精义。只有巴图体现了某种反原型倾向,不论人格准则,还是生活方式,都已从原型的灵性活跃中呆滞下去,成为蚂蚁般蠢动于市场经济的小矮人或时代木偶。原型缺失成为他们灵魂枯槁和智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由此可以把握满都麦人物叙事的深层景象:不论性别、年龄、时代和身份,都以原型的份额决定其文化价值和审美品格;原型成为凝结传统精义和人格精神的符码,一种决定成败优劣、标志根本价值趣向的文化基因。

2.人物原型与情节模式同一。满都麦的小说中,人物系列内原型份额的消长与情节模式的运演存在对待关系

仿佛是这样:雅玛特、嘎慕喇、葛玛、其其格、巴图,他们作为一些原型,恰恰就是早年骑一匹骏马纵入草原深处的“我”所追寻到的目标景象。这个原型系列所制导的题材内部逻辑显示传统正在流失,文化正在式微,人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从身体的老,到传统的死,直到精神的亡,满都麦在写寓言——一个民族、一种古老精神的持有者和古老文明承担者的寓言,一篇一篇走向哀伤和悲凉……满都麦的题材叙述显示了人物原型与情节模式之间的现象学同一,亦即其人物和故事多半是满都麦从母亲、父亲以及蒙古美女的种族记忆和审美想象中敷衍出来,在同一被给予性条件下的心理操作,本质是人物原型化与情节模式化的拼接和化合,下面继续论述之。

(1)原型的对立构成模式义涵互补。《四耳狼与猎人》写猎人虐杀生灵遭到报应的故事,是古老的因果报应模式的现身说法。但是这个模式有两套操作,一是猎人海达布掬回狼崽喂养是为了长大后谋其皮而杀之,二是海达布的情人杭日娃却不忍杀生悄悄把狼崽子放走了。海达布与杭日娃是两个对立的原型,杭日娃是母亲原型,生生、爱养、济助危难、慰藉孤弱,滋育了从人间世到大自然乃至宇宙本体都能关照到的传统美德;海达布则丧失了这种凝结传统精义的原型,成为没有根底的反原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巴图的变形,其生命执着无非是贪婪和自私。这就导致两种不同的模式操作,雪



天峡谷中、岩崖上发生了双重报应：一是海达布杀生被狼群包围险遭灭顶的恶报，一是四耳狼感恩杭日娃当年放生、劝阻同类使海达布逃生的善报。两个原型主导，两个情节层面，从而形成语义互补，其共构话语是狼比人更善于感恩、更富有人性、更存有宽恕和仁慈的情怀。人应该忏悔自己的恶行了！我们注意到，作为模式操作者，原型从灵魂深处就确定了不同模式运演的人性逻辑，所有的故事都从原型或反原型的意向中流出，显示了意象对于题材的吞噬。

(2)模式的错接构成意向性对象世界的强烈反差。中篇《人与狼》是满都麦自觉运用意象题材化的典范之作。小说可分为两个叙述层面，题材层面写阿司令(红卫老汉)搜捕狼、迫害人、最后遭到报应的故事，寓言层面则写母老狼救崽外甥的故事。小说穿插了梅花母狼喂养蒙古祖先的传说，不仅赋予狼以神灵般的仁慈和智慧，而且提炼了民间狼传说中救仔、报仇、喂养孤儿及老毙崖隙的神异成分，使狼超越象征或拟人义域，从生物可能和人性逻辑上融入“文革”叙事，从而使两个层面左右穿插，相互融洽，就像骨与肉、水与鱼一样，整个叙事一体化并寓言化了。有意思的是，狼的寓言和“文革”叙事^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模式。寓言部分显示了狼远远超过人的对于种族、同类、异己或异类的仁慈和善心，而叙事部分则演示了以阿司令为代表的人超越生物原则的异想天开的残忍和野蛮。满都麦不时转换视角，或者以狼的眼光看人的暴虐，或者从人的感知体验狼的无助，或者超越人与狼进入元叙述^⑨，统摄两个模式，生成整体结构。两个模式的并植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狼的寓言被植入“文革”叙事，形成倒错而荒诞的世界情景。如动物的狼活现为人的角色，不仅具有人的心眼、胆识、同情和悲伤，而且由于狼的独特感知更深刻地体验了人的残忍和暴虐；作为人类的阿司令却运演为动物，不仅丧失了人的良知和理性，而且由于智能优势乃无以复加地强化了其冷血和残忍。《人与狼》的模式操作可以这样来分析，就单一意象其模式操作言，意象与题材的原型同一和心理同构决定了它们的现象学关系，所提交的典型情境是：在人的原型心理之下，即使狼也能做出人的事情，其世界就是